



人文与社会译丛

RUSSIAN THINKERS

俄国思想家

第二版

Isaiah Berlin

[英国] 以赛亚·伯林 著 彭淮栋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人民日報出版社

RUSSIAN THOUGHT

俄国思想家

第二版

Collected Edition

（全四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思想家 / 李慎之著. — 2版. — 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3.12

俄国思想家

第二版

Isaiah Berlin

[英国] 以赛亚·伯林 著 彭淮栋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思想家 / (英) 伯林 (Berlin, I.) 著; 彭淮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Russian Thinkers

ISBN 978-7-5447-1583-6

I. ①俄… II. ①伯… ②彭… III. ①思想家-思想评论-俄国-近代 IV. ①B5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408 号

Russian Thinkers by Isaiah Berlin

Copyright © Isaiah Berlin 1948, 1951, 1953, 1955, 1956

© Isaiah Berlin 1960, 1961, 1972, 1978

'Herzen and Bakunin on Individual Liberty' copyrigh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55

This selection and editorial matter © Henry Hardy 1978, 2008

Introduction © Aileen Kelly 1978, 1998

Glossary of Names ©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200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231号

书 名 俄国思想家

作 者 [英国] 以赛亚·伯林

译 者 彭淮栋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Viking Press, 197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92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583-6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作者前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Dr. Henry Hardy)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不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Dr. Aileen Kelly)为此书补足一篇导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犁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

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编者前言

我收编并重印以赛亚·伯林大部分已出版而至今尚未成集的文章,共得四册,这是第一册。他的论述大多流散四方,且往往沦佚于僻冷难寻之处,其中多数已绝版,成集重刊者至今仅五六篇^①。这四册,连同他已出版作品的完备目录(重印于稍后一册)^②,将使他更多作品比前容易取得。其应如此,理由甚明。

为了这个集子,作者重写一些段落——主要是翻译文字。此外,除开必要的改正,以增补不足的参考资料,诸文都原形重印。

本册收取伯林谈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思想的文章。《俄国与一八四八》(‘Russia and 1848’)初刊于二十六期《斯拉夫评论》(*Slavonic Review*, 1948);《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初刊于二期《牛津斯拉夫论文集》(*Oxford Slavonic Papers*, 1951),原文较短,原题《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Lev Tolstoy’s Historical Scepticism’),后来稍加增补,以现

① 《自由四论》(*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1969; New York, 1970)和《维科与赫尔德》(*Vico and He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1976)。其余选集都以别种语文的译本出版。

② 请参考 Henry Hardy,《以赛亚·伯林著作目录》(‘A Bibliography of Isaiah Berlin’),刊于 *Lycidas* (牛津 Wolfson 学院杂志), No. 3(1975), 页 41—45; 其增补与订正, 见 *Lycidas*, No. 4(1976), 页 42。

在的题目,由威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Weidenfeld and Nicolson)在一九五一年重印于伦敦,又由西蒙与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在一九五三年重印于纽约;《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Herzen and Bakunin on Individual Liberty’)原刊于E.J.西蒙斯(Ernest J. Simmons)主编的《俄国与苏联思想之续与变》(*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5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总题为《辉煌的十年》(‘A Remarkable Decade’)的四篇文章,本名《奇妙的十年》(‘A Marvellous Decade’),分刊于《文汇》(*Encounter*)四卷六期(June 1955)、五卷十一期(November 1955)、五卷十二期(December 1955)及六卷五期(May 1956),原是一九五四年诺斯克理夫讲座(Northcliff Lectures)的系列演讲[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举行],后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三节目部播出;《俄国民粹主义》(‘Russian Populism’)是范求理(Franco Venturi)所著《革命之根》(*Roots of Revolution*)一书的导言(London, 1960: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New York, 1960: Knopf),又刊于《文汇》十五卷一期(July 1960);《托尔斯泰与启蒙》(‘Tolstoy and Enlightenment’)是一九六〇年国际笔会赫蒙·欧德纪念演讲(P. E. N. Hermon Ould Memorial Lecture)讲词,初刊于《文汇》十六卷二期(February 1961),再刊于《比刀剑更有力》(*Mightier Than The Sword*, London, 1964: Macmillan);《父与子》(‘Fathers and Children’)是一九七〇年罗曼尼斯讲座(Romanes Lecture)讲词,一九七二年由伦敦克拉伦顿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印行(一九七三年修订重印),并在《纽约书评》刊出(*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8 October, 1 and 15 November 1973),又作为罗斯玛丽·埃德蒙兹(Rosemary Edmonds)所译屠格涅夫《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的导言(Har-

mondsworth, 1975; Penguin)。感谢有关各方惠允重印这些文章。《辉煌的十年》、《俄国民粹主义》及《托尔斯泰与启蒙》原无脚注,此处仍旧。俄文作品之英译,若另无声明,概出伯林手笔。

熟知作者在此领域中作品的人,曾注意到两篇重要文章未收。其一为赫尔岑《彼岸书》(*From the Other Shore*)与《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 London 1956)英译本导言;其二,为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所译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My Past and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1968; Dwight MacDonald 编辑并缩简, New York 1973, London 1974)的导言。不过,二论所涵盖,与本册有关赫尔岑的两篇文章大致相同。本册不选前者,后者归入思想史的一册,同样得宜。^③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此处只能先择最重要者。首先,这第一册的详尽编辑,是凯利博士的功劳,没有她在俄国语言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方面的专精知识,这工作不可能完成。在一段异常繁忙的期间里,她不惜时日,研究解答我的提问。对她,我受惠既巨,感激亦深。关于我不断坚持整个文集集合出,伯林本人一直

③ 伯林同属这个范围的其他论述,读者也许有兴趣,备列如下。简短的电台广播谈话,得三篇:《成为神话的人——别林斯基》('The Man Who Became a Myth—Belinsky'),刊于 *Listener*, 38(1947);《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Plekhanov'), *Listener*, 56(1956), 后以《俄国社会主义之父》('Father of Russian Socialism')为题,重刊于 *New Leader* (美国), 4 February 1957;以及《俄国知识阶层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Intelligentsia')为题,刊于 *Listener*, 79(1968)。 *Foreign Affairs* 有三篇,谈现代俄国,不严格属于这范围,但与本书所收诸文颇有可以合勘之处,如《斯大林元帅与治术》('Generalissimo Stalin and the Art of Government'), *Foreign Affairs*, 30(1952);《俄文化中中之沉寂》('The Silence in Russian Culture'),与《苏联知识阶层》('The Soviet Intelligentsia'),二文都刊于 *Foreign Affairs*, 36(1957)。关于书评,以及其余比较小规模的作品,请读者参考注②所述书目。

相当怀疑、而且愈来愈怀疑值不值得。但是,对这点,以及对我经常过嫌苛求的细节探访,他仍一贯周到体贴、亲切和悦,慨赐教益。关于《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莱斯莉·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的协助堪称珍贵。伯林的秘书帕特·乌捷欣(Pat Utechin)制作索引,也在所有阶段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协助与鼓舞。

亨利·哈代
一九七七年二月

附 言

上面这篇前言写成以来,已有两本文集以精装本问世:一为《概念与范畴:哲学论文集》(*Concepts and Categories: Philosophical Essays*, London, 1978; New York, 1979),一为《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1979)。本文注②所指的伯林著作最新目录,收在上述后面一册里。

前页所提赫尔岑《彼岸书》与《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有平装重印的译本,伯林所写导论亦经修订,附入其中。

《俄国思想家》曾由霍加思出版社(Hogarth Press)再版,有所增补。我们这本新版的《俄国思想家》,另外又作过几处小小订正。

亨利·哈代
一九七九年四月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解释俄国革命，罗素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

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鹜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对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制幻想”(great despotic vision)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the post-Renaissance world)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live through)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主题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

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化的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责任,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责任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moderation)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synthesis)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不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马基雅维利与赫尔德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claustrophobia)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顺从(conformity)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

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宪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historiosophical)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